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九六期 ——  
(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206d)

---

【人物追踪】百般委曲难求全——一个人文学者的悲哀	周启博
【往事追忆】红卫兵小报和我（十三）	周孜仁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人物追踪】

百般委曲难求全  
——一个人文学者的悲哀

• 周启博 •

【编者注：文革中曾参与“梁效”写作班子工作的周一良先生去年逝世，北京刊物《群言》向家属征求回忆稿件，周先生之子周启博如期交稿而未获刊登。】

### （一）尴尬群体中的一个

父亲周一良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去世，享年八十八，当属高龄。遗憾的是他未能把想说的话全部形诸文字。

父亲对子女随和，不象母亲有时不严自威。但他少与子女谈心。以我观察，他有两批较能推心置腹的朋友。一是留学哈佛的“学友”，青年学子在异国共度寒窗，铸就友谊。二是文化革命中因“反聂（元梓）”而同被关押殴打，和因“梁效”而同被禁闭整肃的“难友”。学人罹难共度铁窗，遂成莫逆。我自己成年后很少与父亲深谈，直到年逾不惑，发现自己青少年时是在谎言包围中渡过，才有意识地找父亲交流，并探索他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变革。

父亲是一个企业世家兼文化世家的长子，家教是忠恕之道和谨言慎行。少年青年时潜心文

史，所在学科前辈和同侪对他颇为看好。如果他能按自选方向走下去，学术上当有可观成就。然而他生不逢时，在中年以后被社会环境压倒，奉领袖为神明，把改造思想以达到领袖要求当作高于学术甚至家庭的终极目标。每当他未泯的人性和常识与领袖的方针冲突，他都认为人性和常识是自己未改造好的表现，“改造思想”成为他永远追求也永远达不到的目标，而他从不怀疑“神”即领袖是否有什么不对。直到被领袖的党招进“梁效”写作班子，又被同一个党定为反党反领袖而予以整肃，才开始反思。他噩梦醒来，已是暮年。学术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他还能作的，是把自己的经历和教训形诸文字，使后人能以史为鉴。

丧事完毕，我即为生计奔走南京等地，闲暇时萦绕脑际的常是父亲未说完的话，还有他后半生的经历。在津浦线上，玄武湖畔，我搜索久远的记忆，写下了我能想起的代表父亲思想变化的点点滴滴。

一九四六年，父母结束了八年美国留学生活，携带一岁多的我先乘火车后转运兵船回国。像他们的同辈学子一样，父母亲“学成回国”的民族意识和“服务派出单位”的道义责任感很强，与三十年后我这一代留学生的精神状态实不可同日而语，再加上即将见到被抗日战争阻隔多年的长辈亲友，父母十分振奋，忘却了寒窗苦读和育儿做工的疲劳。我当时刚刚学步，白天父母不得不牵着我四处走，晚上我又经常哭闹，惊扰四邻。惹得同行美国旅客不断打来电话抗议。母多次道歉后终于耐不住说“你也曾经是一岁孩子来着！”四邻遂不再抱怨。父亲曾在我当时相片的背面写道“这孩子十分累人”。留学生们在太平洋上颠簸数周后安抵国门。父亲依约回派出单位燕京大学任教，一九四七年转往清华，在那里渡过了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前的三年。

那时大学是国共军事厮杀之外的另一战场，中共地下党极为活跃。父亲对国民党失望，对中共因不了解而抱有希望，所以参加了一些中共发起的反蒋活动，也在家中为中共组织的学生护校巡逻队提供过饮食。父亲有请来客签名的习惯，他的签名簿上有从学界闻人胡适到日后位居要津的艾知生、朱熔基的各色人等。中共地下党以师生伙食问题发动反蒋反美签名和游行，声势浩大。我问过父亲当时校内师生营养是否坏到十多年以后中共治下饿殍千万的程度，他如实说当然没有。我也向当时在校学生求证过，答案是当时学生食堂粗粮青菜管够，所以学生是吃饱之后上街游行反饥饿的，国民党并未因此开枪。对于轰动一时的美军强奸北大女生事件，父亲采取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等人的客观态度，没有听信中共的炒作。我见到他日记中记下的国民党警察认为有伤风化要将该女生和美军驱离东单广场的经过，以及他和同事对此事的谈论。

国人在一九四九年不明智的选择，成就了领袖毛泽东的皇帝梦。父亲这一代知识分子中，当时对中共有清醒认识，并有条件离开大陆的是少数。多数人怀着期盼和兴奋或者不安与无奈的心情留了下来，浑然不知领袖怀着早年报考北大落榜的嫉恨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将在以后几十年如何收拾他们。当时的杰出政论家储安平，曾提醒国人民主在国民党统治下是多和少，在共产党统治下是有和无的问题。但他自己也留了下来，何况父亲这种不谙政治的学人。

一九五零年，父亲随北大、清华等校师生去四川眉县参加土改。这些知识分子参与了无偿剥夺合法拥有田产者，有的甚至目睹了枪决自食其力者，死刑的罪名就是是合法拥有田产。领袖以杀人立威，也提示了知识分子未来的命运。有产即有罪的“原罪”观念，不久就发展到有知识也有罪，并在以后几十年禁锢父亲的思想。知识分子们在“斗地主”时没有想到农村拥有财产者的今天就是城市拥有知识者的明天。

数月之后，有各种具体名目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果然开始。父亲的前辈同辈学人中，不乏有独立人格和深厚学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多年来对执政的国民党监督批评，克尽言责，被时仍在野的领袖引为战友与同路人，以助其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大业。曾几何时，领袖

登基，这同一批学人天真地以为新政府会象国民党一样容忍他们指摘自己的缺失。岂知领袖以思想改造大棒劈头打下，学人面临在国民党时代未见的高压，他们后半生到死都作不完的检讨就此开始。知识分子有知识，必是剥削工农得以上学而来，所以有知识就有罪，如再对领袖和当局不敬，则罪上加罪。中央、各省市和学校报刊连篇累牍登载全国、各省市和学校知名学者的文章发言，内容除自我批判外全无他物。据父亲当时的学生介绍，清华当局将知识分子按左中右排队，父亲年轻，被认为历史清白。同时父亲所在清华历史系有比父亲资深的聂崇歧教授、父亲在哈佛的齐思和学长等，他们在内战后期曾为保存国家元气和减少人民苦难而呼吁和平，为当时打内战正打得顺手的领袖所不喜，或曾在玩笑时对领袖不恭，而被重点拘禁批斗。有他们首当其冲，父亲被划为团结使用对象。

传记“历劫终教志不灰”，记录了父亲的老师顾颉刚老先生白天开会被迫辱人自辱，晚上悲愤委屈痛不欲生的经历。父亲的回忆中对这一时期只以一句带过。我再三问他，他说已不复记忆。这是因为他已带上“原罪”的紧箍咒，认为领袖这样处置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加之自己当时过关也相对轻松，所以未留深刻印象。

当局在思想改造运动之后趁热打铁，开始了贻害科学教育几十年的院系调整。国民党时代行之有效的院校系科设置，被强制解散，按照苏联模式重新组合。父亲此时被分到北大历史系任教研室主任。

在院系调整中人文学科受害远大于理工学科，许多人文专业如心理学，社会学从此被降级或取消。原长北大历史系的著名史学家郑天挺，一九四九年受胡适委托和哲学家汤用彤共同在新政权下照看北大，此时郑被遣送天津，以便给中共党内历史学家翦伯赞让出历史系主任位子。我家在北大的邻居周先庚教授，三十年代在斯坦福大学获心理学博士学位。父亲说他聪明过人，但终其一生，他未能施展才学。在西南联大研究劳工问题卓有建树并留学美国的社会学家史国衡教授，被分发到清华图书馆，从此告别社会学。

一九五六年初，高教部为当局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准备了关于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提到父亲一类人时说他们“受旧社会影响较小，解放后接收新鲜事物较快，政治思想进步较大……这种人对马列主义理论与苏联先进经验是积极学习，对学术思想批判也是较自觉的参加的。一般都比较年轻，与党团员，青年助教有较密切的关系，有入党的要求，有些也可作为培养对象。有些虽学术地位不够高，但有发展前途，如陈阅增，周一良等。”报告的调子是，比父亲年长的知识分子大约只能当作批判对象，父亲这个年龄组尚可利用。父亲获得当局这一好评，原因之一是一九五五年写了批判胡适的文章。胡适是父亲在一九三零和一九四零年代尊敬的师长，两人在中国和美国都有过相当深入的学术交往。现在既然领袖要批判胡适，父亲当然应命上阵。虽然过去和胡先生相熟，但那时胡已不在大陆，无需面对，父亲心理上尚能承受，但他没有想到事隔半个世纪自己对此会十分悔恨。而且不久之后，领袖就要他面对面批判每日朝夕相处的同事和学生。

父亲在一九五六年被当局接受入党，并由教研室主任提升为历史系副主任。父亲的这段好日子过了不到一年，中国知识分子就再次大难临头。一九五七年，领袖发动整风反右，先诱人发言，再以言定罪。全国几十万人被戴帽子，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的惨剧四处上演。父亲在清华的好友丁则良教授此时已调去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任教，隶属中共党内史学家吕振羽领导。吕以自己著作请丁指正。丁如有心机，自当捧场几句交差。但丁是朴实学者，认真研读之后写下多条意见，致吕不悦。反右风起时丁正出国开会，吕将丁缺席定成莫须有三人反党集团之一。丁返国抵京，闻讯如雷轰顶。丁伯母担心丈夫出事，从长春赶来北京终日陪伴，丁伯伯明白自己已无出路，也为减轻家人将受的牵连，表面不动声色，每天像他人一样看大字报，暗中写好遗言，终于找机会躲开亲人朋友在北大投湖。当时我读初一，一天，母亲告诉我丁伯

伯在未名湖淹死了，看着母亲一脸少见的焦灼和紧张，我问湖水不过腰怎么能淹死，母亲说丁伯伯抓紧水草把头埋进泥里，是自杀。父亲不但不能为丁辩诬，还须参加会议批判老友，他发言批判丁伯伯是“辜负了党的培养重用”，以为调子已经够高，不料接着发言的陈庆华更加凶猛：“这种人活着也起不了好作用！”父亲才知道自己的表现还没满足要求。其实丁与陈私交不错，丁自沉之前写下留言给陈说“我已划右派，与你只能来生再见”。陈知道如要自保必须以高于所有人的调子批丁。父亲绕丁伯伯棺木以告别，并将丁遗书长置案头。我爱翻看父母案头文字，所以记住了遗书头一句话：“我出此下策，是因为实在记不起自己所说过话……。”丁伯伯鸣放整风时人在国外，没有机会说任何话，当然无从记起。可是当局从日常谈话中随意罗织几句，说你说了，你就是说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丧夫失怙只是丁伯母和子女噩运的开始。随后他们被逐出学校，迁离长春，剥夺受教育权利，似将永难翻身。但丁伯母坚韧不拔，独力养活全家。丁伯伯的弟弟在各种大小会议发言一次次批判冤死的兄长，换取自己的生存，也得以在以后数十年中每月能从微薄工资中挤出十元接济孤儿寡母。丁伯伯的子女也都自学不辍。当领袖晏驾，压了右派子女二十年的巨石终于松动时，丁家子女全都考取学校，成为专业人才。两个儿子留学后在美任教，一人并受聘回北大讲学，得以凭吊丁伯伯自沉地点，并与父亲畅谈。父亲去世后，他在信中对我说，我们两人的父亲这一代学人，无论怎样改造自己，均不能被领袖和当局接受，诚为“百般委曲，无以求全”。

反右的利刃，也伤及父亲的亲属。我的两位姑父，一是诗人兼翻译家，因参加杜聿明滇缅抗日远征军的经历被整；一是建筑设计师，以言论获罪，牵连我的姑母和表弟妹们。我母亲行事说话都是非份明，不隐瞒自己观点，因此开罪本单位领导。反右以后，母亲在思想教育活动中向单位领导汇报思想，提到写信动员父亲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弟弟回国，用了谚语“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单位领导认为母亲“诬蔑社会主义祖国是狗窝”，罗织罪名进行批判，并准备了右派和漏网右派之类帽子。母亲满腹委屈回家，父亲不予安慰，反而严守官方立场，母亲不堪内外受敌，与父亲关起门来争吵。我听到母亲说“我也一头扎未名湖算了”，感到紧张，想问个究竟。但父母对子女守口如瓶。后来案子被“甄别”平反，母亲告诉了我，父亲仍只字不提。我闻此事甚为不平，对高中班级团干部评论说，有党如此，这个团我不入也罢，或者入三青团也行。团干部大骇，我因此到高中毕业也不曾入团。母亲是中文专修班对外汉语教学骨干，党内领导郭良夫奉上意组织编写中国第一本对外汉语教科书，以向世界吹嘘领袖，推销主义，输出革命。母亲承担了主要工作量，顶着政治罪名的压力，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完成了这本在国内外影响深远的拓荒之作。到一九六零年教科书出版，母亲姓名不见于书页，人也被逐出她热爱和擅长的对外汉语教学岗位。二十年后，郭某人自传中倒把该书列为自己著作。当局如果需要学人的知识和脑力，就挤尽榨干，然后常常鸟尽弓藏，母亲即为一例。

父亲本人历经反右的血雨腥风而得全身而退，但目睹老友屈死，妹夫中箭，自己妻子横遭批判，当然意识到不为领袖所喜的下场之惨。如果自己因一句话、一行字肇祸，家中子女和残废的岳母生活将立成问题。因此他在原有的谨言慎行之外，又修改了写日记的方式。一九四九年以前，他每每写下自己和友人对时政的看法，反右以后的日记则只是何时何地开什么会的豆腐账，再无表达思想的文字。正如我一个叔叔当时告诫我所说的：“文字的东西最要不得”，因为那是一个没有隐私权而盛行文字狱的时代。

知识分子们尽管被领袖剥夺了说实话的权利，甚至不违心说话的权利，毕竟有些学人不甘心交出仅存的记下自己思想的自由。父亲的老师顾颉刚、老友谭其骧都有记载自己思想感情的日记传世。他们的后人和学生得以据之写出生动翔实的传记。父亲的老友吴于廑，白天受批判，晚上写日记还有兴致吟诗填词，调侃时事。多年以后，我在吴伯伯长子处见到这些珍本，很佩服他的胆气与才华。我们的父辈学人写下他们的日记时，我们尚在稚龄，无法读懂。现在我们心智成熟，有兴趣探索长辈几十年来心路历程。如能与父亲促膝共读日记，回忆讨论，该是何

等乐事。即使长辈已故，我们有日记捧读，能穿透历史的烟尘，品味上一代学人经历的苦辣酸咸，也是极有意义的。可惜父亲没给我们留下这扇心灵的窗户。

一九五七年以前，中国社会人际关系，尤其是知识分子，学校师生的人际关系正常，人们远不象反右以后那样互相戒备。父亲同事中一青年女教师因恋爱不顺利而宣布独身，父亲为此找她谈话开导。父亲对学生高标准要求，不轻易表扬。学生问父亲解放前后学生质量如何，父亲也实话实说“解放后质量当然不如解放前”。反右彻底改变了人际关系，迫使父亲大力提升“党性”，压抑人性。历史系当局按照领袖旨意对知识分子批判整肃，需要既紧跟领袖又有学术水平的所谓“又红又专”者来打头阵，因为“红”、“专”二者缺一，火力便嫌不足。父亲符合此二条件，成为“组织”的过河卒子。他声色俱厉地主持会议批判他赏识的右派学生夏应元，说夏“辜负了我的希望”。他批判编写“北京史”的同事，说商鸿逵教授是“黄色文人”，袁良义老师“政治上从无要求”。历史系学生张胜建曾被错划成反革命，分配时学非所用，回校请父亲帮助解决专业对口问题，父亲不予帮助，而且对张以“大道理”说教。

给领袖当枪使换得“组织”的青睐，代价是疏远了群众。历史系教授杨人鞭是一九四零年代储安平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反右中有惊无险，侥幸未带帽子。杨是我家近邻，我记忆中五十年代他常来与父亲闲谈，烟抽得凶，喜好京剧。一九八零年代我读到杨在四十年代的民主自由主义言论而肃然起敬时，杨已去世多年，我因而无从当面致敬。杨夫人张蓉初也是历史系教授，二人无子女，杨去世后有人提议张请父亲帮忙向上反映困难，以将子侄辈调来照料生活。张说父亲“管的是大事，这种小事是不管的。”可见隔阂之深。直到为“梁效”事栽了跟头，父亲开始全面反思自己追随“领袖”的过程，才悟到今是昨非，在一九八零年、一九九零年代里用各种场合向自己批判过的同事学生承认错误，表示歉意，获得了他们的谅解。我家和商鸿逵教授的一家现在也有着良好的关系。

父亲的这个失误，使我联想到我的岳母。她与父亲同龄，是一文盲农妇，早年历尽贫苦，也受过农村有产者的气。但她认定自己的不幸是命运，改善自己命运只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而不能靠给一时掌权者当枪使去伤害和剥夺曾比自己幸运的人。岳父母的贫农成份，使他们成为领袖在农村历次整人运动的当然依靠对象。每次当局派到村里的工作组都动员岳父在斗争会上给他们当枪使，向被整肃者发难，思想朴实的岳父也每次都被他们说动。但岳母坚守原则，以分家相威胁，不准岳父按当权者定的调子发言伤人，并坐镇会场监督。工作组发现每有岳母到会，岳父发言火力便不足，不得不劝阻岳母到会。岳母历经土地改革，四清社教和文化革命等关口，从来没有对历次受迫害者如地主富农、四不清干部和“牛鬼蛇神”落井下石，她的为人因而受到本村各类人的尊重。中国农村人口中如能有更多人实行我的岳母信奉的不给人当枪使的原则，领袖当年发动“湖南农民运动”就不那么容易，中国社会一九四九年以后也会少了许多戾气和血腥。领袖能在中国城市知识分子群中随心所欲地整人，每次打击对象一经领袖选定，立即被墙倒众人推。领袖一句话或一个暗示，就能左右全国舆论，其原因除了领袖的威权之外，封建文化传统和知识人素质不高也起了重要作用。国人目前仍然倾向于把一九四九年以后所有灾难归因为领袖，而不愿探讨每个人自己当时能否表现得更有入性一些。希特勒法西斯覆灭之后五十年，德国新一代历史学人开始研究一九三零、一九四零年代每个普通德国人为希特勒反人类罪行推波助澜的责任，历史专著记录了许多普通德国人在二战时期每天作完本职工作以后自愿到集中营充当看守，以便参与虐杀犹太人和战俘，从而向整个日尔曼民族的良心提出了质问。希望几十年内中国新一代历史学人也能有类似的研究成果问世，非如此难以提高民族素质和防止下一次灾难。

父亲在五十，六十年代“改造思想”得法，比同侪更受信用，数次被派出国。一次他回国路经缅甸，在使馆过夜，使馆厨师以前曾在祖父家做饭，对他以“大少爷”相称，他应对得当：“现在都是同志啦。”回家后他对家人讲到此事，颇有“改造有成，已被当作自己人”的自得。

一九六三年，我高中毕业。我原对人文有兴趣，但报考了理工科大学。父亲对我的选择不干涉或评论。几十年后，他说我“还是上理工科好，上文科就该进监狱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祸起。父亲响应领袖号令，积极参加，招来五顶帽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美国特务，反共老手和老保翻天急先锋。母亲被连累关进劳改大院，我从大学分配到黑龙江边远林区。在林区我遇到与我同龄的工人，说话有北京口音。原来是北京林学院教师的孩子，因父亲是右派而全家下放林区。他对我能在北京上大学表示羡慕，我则感谢父母不是右派，领袖才没有剥夺我受教育的权利。

父亲在一九六七、六八年间被关押劳改批斗，无数次书面和口头交代本人“罪行”，所以他对这些事的细节已烂熟于胸。他以工整字体把本人交代抄成一厚本，以随时温习。因此不论“革命群众”或“看守人员”问到什么事的时间地点有关人等，他都能脱口报出，与以前的交代毫无出入。我当时在大学，有工人毛思想宣传队督导检查家庭影响，经常需要流利报出父母罪行，因此也翻阅这个本子，所以对父亲履历的主要部份耳熟能详。父亲从被关押的劳改大院获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本子继续和他书桌上常用书放在一起，因为他不知什么时候可能重遭提审批斗关押，所以随时准备“二进宫”。

“原罪”的紧箍咒和对领袖的迷信，使父亲认为文革炼狱是他改造的好机会，所以对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饴。每次被批斗、体罚，甚至在被打得口鼻流血后，他总是用同一句话安慰家人：“我的党性能保我过关。”他在历史系领导班子里共事多年的党内同僚吴维能，参加他所反对的聂元梓派，率红卫兵来抄家。二人各自认为自己是站在领袖一边对抗革命的敌人，所以要在“敌人”面前站稳立场，在这一“考验”的时刻表现对领袖的忠诚。抄家洗劫之后，吴以法官审犯人的口吻问父亲对他们的革命行动有什么想法，父亲也不含糊，摆出真理在手，不怕你人多势众的架势说，你们抄家违反毛主席的“十六条”，完全是非法的。吴率众携大批缴获的“罪证”悻悻离去，对父亲的迫害随即升级。短短几年之后，领袖又决定抛开聂派，把学校大权交给工人宣传队和御林军八三四一部队。这次轮到吴维能被整，而且不堪迫害以至自杀。

我的弟妹因文革不能上大学，父亲对我说：“我们家连续几代读书，脱离工农，以后就不一定，或者一定不上大学才对。”母亲解除劳改后，又被派往江西干校。栉风沐雨，露宿荒原。父亲在北京不忘作领袖需要的五七战士家属，给母亲写信吟打油诗赞美干校的露天厕所：“凉风飏屁股，冷气入膀胱。”吟毕问：“你不觉得雄浑、豪放吗？”

一九七四年，领袖攻讦异己需要有人捉刀，“梁效”写作班子应运而生。打入最底层的人文知识分子忽然有了用了。此时造神运动已达顶峰，神谕下达，如巨手把父亲从五顶帽子底下捞出，掸去尘土，放入梁效班子。一夜间阶下囚变成座上客。父亲倒是宠辱不惊，认为这是领袖和组织肯定自己改造有成，自应以学术兢兢业业服务领袖。社会有识者此时多已看透写作班子是高层权力斗争工具，由领袖的四名打手操纵。父亲思想为“原罪”紧箍咒箍定，又加信“神”，要他有“贰心”也难。我这时在工厂作工，利用在中小学积累的文史常识，积极参加领袖倡导的“工人理论组活动”，以取悦领导，回到家则大讲社会大众如何诟病领袖及其打手。父亲对我质疑领袖深感不安，好几次皱眉对我说：“你怎么老是和方向拧着？”最后终于爆发了一次饭桌上的冲突。那时毛远新长辽宁，声势为各省之冠，似将问鼎中央。我在一天午饭时提起此事，以台湾老蒋小蒋比照老毛小毛。父亲大怒，摔了筷子，午饭不欢而散。母亲对我说：“爸爸过去对你抱最大希望，现在你是他最大的担心，不要在家再提这些事。”我成年以后受父亲斥责，这是最严厉的一次。

如何对待子女对领袖和当局的疑问，是父亲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一大难题。他们身为应该为

子女解惑的父母，自己也有同样的疑问，又深知万一子女把疑问传出去，足以使全家罹祸，所以不准子女提这类问题就成了许多父母为保护全家的唯一选择。作为从那个年代活过来而成人的子女，我们对父母当时不得已的责骂不存怨怼，只感激他们保护子女的苦心。

父亲为御用写作班子服务，遂有文章出版，姓名见报，甚至有党代表、主席团头衔，风光一时。我的姑父是三十年代加入中共的局级干部，历经党内斗争，父亲向来尊重他的经验和见识。姑父来见父亲，告他一时出名未必是好事，劝他急流勇退。父亲囿于既成思路。加之对“功名”不够淡泊，未从其谏，继续当领袖的工具。其实作工具也可有消极应付和积极进取之分，父亲本有条件以年龄或健康为理由适当减低涉入程度，但他选择了积极当好驯服工具以赎“原罪”，提供文史顾问服务，兼写以古喻今的“时文”。多年后领袖的光环褪尽，父亲才认识到自己的老师陈寅恪的思想体系，较“毛泽东思想”价值更高，接受了老师对自己“曲学阿世”的批评，并在各种场合向老师表示了悔过。

一九七六年春，北京民众在天安门发泄对领袖的不满。时周恩来真实面目尚未大白于天下，示威者以周为旗帜挑战领袖。父亲去了现场，但并没充份体会人民对领袖的愤怒。

同年秋，领袖去世，打手倒台。把父亲捧成党代表、主席团的党，又把父亲打成反党反领袖的坏人。父亲几十年中目睹使朋友同事身败名裂的事，最后落到自己头上。物极必反，父亲终于因此开始反思。当初信得越虔诚，发觉受骗以后就越痛心。然而，在被禁闭整肃而后又闲置的几年中，父亲得以重拾久违的历史课题，也算因祸得福。

一些学术界旧雨新知，不计较他还有帽子未摘而和他来往，令他看到“真情”存在于普通人而不在领袖和当局当中。吴于廑伯伯来京开会，住西直门国务院招待所。我一天路经招待所门口，吴正同一批与会者出门，我没把握吴伯伯是否方便和我说话，就没有停留。吴伯伯从远处看到我后就急忙追过来，问我父亲情况，并让我转达问候。我回家报告父亲，可以看出父亲内心的高兴。

父亲在反右时因为批判右派学生夏应元不够凶狠而被“组织”认为立场不坚定，延迟党籍转正一年。夏为减少连累父亲，自一九五七年以后的二十年中回避与父亲来往。这时夏登门造访受审查中的父亲，对父亲说：“您过去是我的老师，现在是我的老师，将来还是我的老师。”“您现在又回到群众中来了”，使父亲深为感动。

父亲一生热衷买书存书，文革被批斗审查时被迫中断，这时又恢复了这一嗜好。躲进书斋，坐拥书城，手摸书页对他是很大的享受和安慰。从这以后直到去世，他买的书和别人赠书总把面积有限的住所堆得下不去脚，我和妹妹抱怨他，他引史学前辈谢国桢先生的话说：“就是明天要死，今天看见好书也要买”。母亲安抚我说：“他只有这一个嗜好，就随他吧。”

一九八四年，“原罪”紧箍咒开始松动，父亲为文表扬他的企业家父亲所作的好事，兼及官至清廷总督的曾祖父。关于国共两党，父亲也有新的认识，在一次同人聚餐时父亲对学生夏应元说，杨人鞭先生他们解放前说“民主在国民党治下是多和少的问题，在共产党治下是有和无的问题”，现在看来是有道理的。对于被组织派进“梁效”又被组织当反革命整肃，仍是他头号伤心事。美国历史教授田浩来北大见父亲，谈话中向他请教《柳宗元和封建论》中的一个学术问题，父亲忽然哽咽，连说为那些文章给我们加罪名是冤枉的。田对这离题之谈甚为惊讶，数年后见我仍以此相询。我告田该文是“梁效”期间所写，而“梁效”案是父亲晚年最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没有在那个年代在中国长期居住过的人不易理解。

一九八九年，父亲来美开会，母亲同行，会后访问在美亲友，再到纽约我家“就养”。国内

民主运动兴起，父亲与亲友通电话，共祈不要流血。但当局终于开枪，父亲痛心疾首，忍不住对着电视屏幕上的“北京屠夫”说“你早点死吧！”。我建议父亲与我同去参加领事馆前抗议集会，被母亲制止。以后几天，我陪父亲访问他在哈佛同学桑恒康教授。桑毕业后在美工作，从联合国退休。桑在谈话中大贬方励之，父亲未置可否。等离开桑家，我立即对父亲说桑没有亲历四九年以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批评方。父亲颌首不语。其后父母又见过老友任之恭夫妇，任说：“过去国民党骂共产党杀人放火，我向予驳斥，现在杀人这一条我是没得说了。”父亲点头。几天后，任在华盛顿地区集会上讲话谴责屠杀。北京消息显示专政利刃再次指向知识分子：“平暴”清查，党员登记，人人过关。我建议父母暂不回去，甚至考虑在我处住更长时间。为避免违心说话，父母思想斗争之后决定在我处等待一段。这大约是校内传闻父母已决定永远不回去的起因。领袖的组织是不能自由离开的，你进去了再想出来，要付代价。我以为六四之后的党员重新登记是个机会，只要父亲在我处住到登记结束之后再回去，“技术”上错过了填表，就可以以最小代价脱身，变成无党派人士。我低估了此事的难度，也低估了当局的威力。父母生存的物质资源全由当局所垄断，他还不致象文学翻译家杨宪益先生那样破釜沉舟，声明退党。

父亲住在我家时动笔回忆他的前半生，此文后来发展成《毕竟是书生》。我读后认为他漏掉了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几十年被打压、愚弄、利用和蹂躏的史实。到一九九三年自传《毕竟是书生》在“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发表，他仍无意增补以上内容。同一年，社科院汤重南先生为文介绍父亲学术造诣，父亲在给我信中说他对于评传的原则是“别人看了不摇头，自己看了不脸红”，因此不同意汤文中“学贯中西”的溢美。与父亲自己写的回忆一样，汤文也回避了中国人文学者一九四九年以后饱含辛酸的经历。可见，当时国内出版界和人文科学界对这一题目有兴趣者不多，因为多数人思想仍象父亲一样受原有枷锁的禁锢。

文化界对于父亲自传有褒有贬，我也直率提出过不同意见。父亲认为自己应该怎么认识怎么说。这时他的帕金森症和脑腔隙梗塞已影响右手，给孩子写家信多靠母亲。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日，他特别给我亲笔写了一段：“我的自传大陆一般反映是说了真心话，而海外的人认为其中尚多违心之谈，思想及社会背景不同，原不足为怪。我以为我们（指父亲和我）之间最大分歧，在对民主革命看法。老头子（指领袖）自认为作了两件事：民主革命与文革。我以为后者应全盘否定，而前者应全盘肯定。年轻人未经过国民党在大陆末期的统治，因而对民主革命的必要认识不足。以两个周家为例，我们家经过民主革命，当然许多方面大不如前，但因非地富，尚不致沉沦覆没，另一个拨道洼周家（我太太娘家姓周，贫农，所在村名拨道洼）试对比一下解放之前和之后，岂非天壤之别！而这样的周家，要比桂林路周家（我祖父家曾长期在天津桂林路居住）其数目不知道多多少倍！这不是民主革命带来的好处吗？共产主义的最后目标，我仍坚信，人剥削人的制度终将消亡。但列、斯所走之路不足取，毛的路也证明走不通。今后怎样才能达到最终目的地，或经过都变成中产阶级而达到（邓小平看来即走此路），或尚有其他办法，恕我已不及待了！”

此后我和父亲就所谓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作了较集中的讨论。领袖及追随他的知识分子利用知识贫乏的农民，并借助国际形势和国内社会经济状况以内战取天下，代价是数千万人命和极大物质破坏。受益的是上台的领袖，伤元气的是国家，倒霉的是全国各阶层人口的多数。我的岳父母家受益是因为儿女当了中共干部和经中共优惠政策上了大学，从而从农民上升为官员和知识分子。中国几亿农民人口中如此改善自身地位的是少数。我太太所有贫农叔叔舅舅家都未能循此路致富，生活大不如我太太一家，因为领袖不可能把几亿农民全都提拔为官员和知识分子。国民党在台湾推行的和平社会经济改革，做到了大多数农民不必改变自己农民身份而仍然致富，才真正是社会进步。被称为地主富农的中国大陆农村有产者，是中国农村文化科技之所在，领袖为煽动贫农给自己当炮灰打天下而对地富经济剥夺，肉体消灭，造成农业生产倒退。40年代末期中国民众的苦难，内战是重要原因。领袖将倒蒋夺权置于人民福祉之上，“投鼠忌器”，才有许多惨剧发生。例如为攻长春故意不准市民出城逃生，迫使市民与国民党守军争食，



以致饿死大量市民。新政权以武力取代旧政权，在中外历史上都不一定代表社会进步。中国历史上就多次有经济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打败汉族入主中原。八十年代赵紫阳幕僚组织农村调查，询问最年长农民所经历的哪个年代农民日子最好过，各省老农不约而同答了军阀时代。如果被询问的老农更高寿些，满清入选也未可知。假若国民党不武力推翻满清，中共不武力推翻国民党，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至少不会比实际发生的更坏。国人二十世纪的首要教训应是不轻易以内战形式的暴力进行社会改革。发达国家如英国有工党的费边主义派，发展中国家有印度的甘地，都以非暴力推进了社会进步，增进了多数人口的福祉。所以我对“民主革命”是否定的。父亲虽然对我的意见不都同意，但仍耐心倾听。

一九九六年以后，舆论控制稍有放松。国内人文科学界开始有一些中青年研究工作者关注“末班车乘客”，即国民党教育系统和中央研究院体制下培养的最后一批知识分子的命运。出版界对这一内容的兴趣也有提高。同时，国内历史较长的重点大学竞相恢复国民党时期的人文系科，窒息多年的中国人文科学，好像有了转机。

一九九八年，韦君宜先生的《思痛录》出版。《思痛录》和父亲的《毕竟是书生》同被收入“百年人生丛书”，父亲看了以后立即寄我一本。父亲自“梁效”以后乏人问津，这时开始结交不少新朋友，切磋内容除人文学术外，多是人文科学和学人的遭遇。官方对于父亲，似仍当成控制使用对象。这也是当局对待权力斗争失败一方的惯例。官办学术活动，他甚少能够参与。我以为这是成全了他。他精力有限，到为政治服务的官办学术活动上当花瓶，不如在家和民间同道切实总结一下自己的经历更有意义。这几年他出了两本短篇集，若干文章。可以看出他向他的先师陈寅恪先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又迈进了一步。季羨林先生执教逾半世纪，但他数十年作育英才最亮丽的一笔应数一九八九年到天安门广场慰问学生。因为此事冒官方之不违，《季羨林传》洋洋数百页，无一字提到此事。父亲在给季先生新书作序时，明确赞扬他“劝勉”学生的义举。“西安事变”的真相，被歪曲了几十年，直到当事人张学良近年来开口纠正。这一段现代史，和父亲专攻的古代史无关，但父亲为文批评不尊重史实时，明知为当局所不喜，仍以此为例。对于被领袖撰文斥责奚落的司徒雷登，父亲也提出了更公允的评价。

父亲向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思想意识回归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对他的师长胡适先生的态度。一九七六年以后，国内人文科学界用了一二十年时间才初步驱散领袖的阴魂，挣脱马列的桎梏，开始呼唤学术自由和独立人格。这时国人恍然觉悟，榜样不必到西方去找，中国三四十年代的人文学者群体留下的精神和学术遗产，不逊于西方同侪的成就。而胡适作为这一群体的领头人，其人格和学问在民间终于获得了应有的历史地位。

父亲对于这位自己先追随后批判的前辈，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一九九零年父亲在我家写下短文“追忆胡适之先生”，推崇胡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推不倒的丰碑”。当时国内人文科学界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对胡的否定态度正开始改变，但不少偏见尚未消除，尤其是看不到胡对国民党政权既认同又批评的原则是当时最有利于国家和民众利益的做法。季羨林先生传记就记录了季先生因此说胡是“聪明的糊涂人”。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人五十年代在领袖教唆下向胡泼的脏水尽退，真相现出，胡的人格名节日益获得肯定。父亲这一代曾受胡亲炙的学人十分追悔自己在五十年代随波逐流批判师长，季羨林先生去台访问时向胡墓深深鞠躬。父亲也曾被台湾学术机构邀请访台，由于两岸关系变幻无常而一再推迟，加上他健康日坏，终于未能成行。他购买搜集了全球华文世界出版的胡适文集、书信集，和研究胡适生平的著作，重温六十年前胡对自己的教诲提携，忏悔自己五十年代对师长的冒犯。去世前两个月，他在“郊叟曝言”序言中写到，“自己不可能到胡先生墓前去顶礼膜拜，赔礼道歉了，但愿以文章表达诚恳的请罪的心情。”这比十年前在我家时的态度，显然进了一步。我相信自己未来将有机会造访宝岛，晋谒胡墓，向这位二十世纪杰出的人文学者致敬，满足父亲未了的心愿。

母亲在二零零零年骨折住院，辗转病榻五个月后去世。这对父亲无疑是很大打击。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而还有许多要说的东西，所以不顾劝阻，加大工作强度。去世前几天指示我修改关于吴宓先生的文章时，还提到已就关于文化世家和旧制族谱重男轻女（女作家张爱玲因此没有列入李鸿章族谱）两篇文章打好了腹稿。但天不假年，他未能留下所有想说的东西。

父亲去世后第七天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有数百人到场，都是来自民间的同事、友好和学生，当局没有出面。学人生前身不由己曾为御用，身后能和官方保持些许距离，聊以补偿被剥夺的人格，也是不幸中的一幸。

## （二）独立人格知易行难

八十年代以后，我得以读到前所未见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府互动关系的史实。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这一批学人，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当局监督批评，起到了社会良心的作用，比西方民主政体下的学人并不逊色。一九四九年以后，同是这批人，多数留在大陆，少数去了台湾。去台湾的一般保持了独立的人格。留在大陆的多数人，却在一九四九年以后“集体失语”，几十年中再没有与官方不同的声音。因此大陆以外的华人文化界讥评四起，甚至有了指名道性的“四大无耻”之类说法。我一开始也因此困惑：留在大陆的这些学人是怎么了？我了解了更多事实之后，相信主要原因是两岸知识分子面对不同的当局，因此为保持独立人格需付出的代价有天壤之别。

国民党同共产党一样信仰集权专制。但国民党上层对来自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表现了相当的宽容。四十年代后期，国民党军事上连连失利，政权风雨飘摇，正是需要“乱世用重典”的时候。抨击国民党最力的刊物“观察”却被允许发行直到一九四八年底。中共在上海发动学潮，学生要求与国民党市长吴国桢对话。吴如约到场，学生飧以拳脚竹棒砖头。吴受伤倒地，仍高声制止警卫掏枪，被在场记者誉为“民主市长”。

被父亲尊为师长的人文学者胡适，服膺英美式国家制度，及与之相连的人权和民主理念。当国民党当局施政抵触这些理念时，他常常予以激烈批评。他以讲学、撰文和办刊物的方式宣传自己的理念，以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责任。一九五四年蒋介石推荐胡为总统候选人，胡当即拒绝，据台湾中央日报报导，胡声明“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一九五八年，胡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到就职典礼讲话，称赞胡“个人之高尚品德”。据房向东先生转录胡适秘书的笔记，胡随即当众当面反驳蒋介石，说“总统刚才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因为中央研究院只能管学术，管不到品德，“我们学术界，中央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应作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蒋介石虽面有愠色，并未发火。胡适在台湾和雷震合办“自由中国”杂志，推广自己的理念。蒋介石于一九六零年将雷逮捕下狱。胡直接向蒋为雷申辩，蒋没有接受。蒋迫害雷震是实，但对胡还是网开一面。

父亲在中研院史语所的上级傅斯年，是兼有行政能力的人文学者。曾任北大代校长，西南联大常委等职。四十年代，蒋介石姻亲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劣迹昭著，傅撰文猛烈抨击，迫孔去职。蒋请傅吃饭，要求傅信任自己任命的官员，傅断然拒绝。蒋任命另一姻亲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宋开始腐败后，傅又为文疾呼“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也终于下台。傅斯年保护学生不遗余力，一九四五年他调解昆明学潮，制止国民党地方当局开枪，避免流血。一九四九年去台湾后，在台大校长任内，保护学生免遭警察逮捕，受到学生称赞。傅斯年作为在国民党体制内作官的知识分子，接连扳倒蒋介石的连襟和妻舅，当面顶撞蒋介石，又和蒋介石的地方当局及警察作对以保护学生，蒋介石却没有加害于他。我在钦佩傅的人格和气节的同时，不能不注意到蒋的克制。

法学教授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言批评国民党，被蒋介石打断，张愤然退场。国民党当局将下次开会车马费送上门，张说“无政可参”，原费退回。

上述当局和知识分子的互动关系，远非大陆的文学学者所能想象。大陆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绝不敢象胡适、傅斯年对蒋那样冒犯领袖毛泽东。人文学者梁漱溟，在国务会议发言触犯中共后，要求领袖有让他讲完的雅量，被领袖破口骂下台来。北大校长、人文学者马寅初，提出与领袖意向相左的人口理论，遂被迫去职，连遭批斗。当大陆当局刀锋指向学生时，大学校长们的表现也乏善可陈。

中国知识分子确有因批评国民党政府而死的，如闻一多、李公朴之被暗杀，雷震被监禁后病故。但领袖登基之后大陆知识分子“非正常死亡”人数远远超过闻、李、雷等的人数。领袖本人也以自己超过“焚书坑儒”而自得。根据日本学者近期发表的研究结果，闻一多在抗战后期与中共地下党来往密切，热切要求中共接受他前往延安。由于闻的一个侄子在此前投奔延安被中共整肃致死，中共顾虑闻到延安将使真相暴露，才劝闻留在蒋管区以言论抨击国民党政府。所以闻被杀之前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民主自由主义者的超然身份，而投身于以武力颠覆国民党政府的一方了。

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领袖和当局垄断一切资源。身为知识分子，你本来已有“原罪”，可以随时被当局敲打。若再胆敢批评领袖和“组织”，就罪上加罪，当局可以剥夺你职业、工资、住房、子女受教育权利……你全家即陷绝境。若仍不服，还有监狱死刑伺候。这个社会对反对意见不给任何生存空间，要人在如此既诛心又杀身的压力下坚持独立人格，无异逼人去死。所以就连因帮闲而名列第一大无耻的郭沫若，我对他也寄予同情。因为他的爱子是坚持独立思考而在领袖的体制下入狱、劳改和坠楼惨死的。他自己对青年作者也私下表示过对领袖专制的不满和无奈。

与领袖相比，国民党当局对反对意见的处置要宽容得多。而且，国民党自掌握政权以来总有武装对立面和它打仗，军阀，中共，日寇，再中共，所以它从来没有真正统一全国。反对派如不见容于国民党中央，还可托庇于地方派系，或避入租界和逃到中共控制区。国民党控制下也保留了相当的民间经济，反对派人士丢了政府的饭碗，还可到民营经济中谋生。所以尚有相当的生存空间。对于大陆以外臧否父亲和他的师长这两代知识分子的人，我以为他们应先携眷在领袖治下的环境中生活几年，再发议论。

领袖对几亿国人，尤其是其中知识分子洗脑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为了生存而承认强加的罪名，努力修正自己以跟随领袖翻来覆去的指示。领袖归天，高压不再，生命危险解除，但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桎梏依然毫无松动。继续表示尊崇领袖和认同领袖对自己的戕害。清华水利系留美归国的陈梁生教授到了八十年代还坚持自己被批判整肃是应该的，坚持自己确有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名作家丁玲在五十、六十年代被诬陷为反党、右派，受到严重迫害。劫后余生，却继续对领袖和当局忠贞不二，“党不爱她她爱党”。直到一九八九年，仍然与对市民学生开枪的当局保持一致。是否这些知识分子心理上出了毛病？作为这些知识分子一部份的中国心理学者，没有起码的学术环境研究这一问题。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两名劫匪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劫持了三女一男四名职员为人质。警察随即包围现场，于二十八日突击成功，救出人质并擒获劫匪。人质在警匪对峙的六天中，生死完全由劫匪决定，人质为求生而认同劫匪，向媒体和政府总理帕尔梅呼吁撤走警察和满足劫匪要求，这是合乎正常心理的行为。人质获救以后，生命威胁解除，却继续认同劫匪，向媒体和法官赞美劫匪，感谢劫匪不杀和善待之恩。一位女人质竟和劫匪之一订婚。瑞

典是一个民主开放的国家，因此全世界通过媒体看到了事件全过程。这个暴力威胁下洗脑生效并且在暴力消失后不可逆转的案例引起全世界心理学界注意。瑞典心理学家Nils Bejorot 把它定名为“斯德哥尔摩症状”，近几十年来劫持人质在全球越演越烈，“斯德哥尔摩症状”频频发生，例如美国报业巨子赫斯特的孙女 Patty Hearst 被左派恐怖组织辛比由尼斯解放军（SLA）绑架后自愿入伙，并参加持枪抢劫银行，所以世界心理学界对这一现象的热烈讨论至今不衰。其实，这类现象早在一九四九年就已经在中国发生，而且时空范围和卷入人数都大了千万倍。手握绝对镇压权力的领袖和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就形成了“斯德哥尔摩症状”中双方的关系。挟一人者劫匪，挟一国者领袖。“斯德哥尔摩症状”为研究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在四九年以后的心理，提供了另一个角度。

每当看到西方心理学界的有关讨论，我常发奇想，心理学家周先庚伯伯身为人质一方的一员，如果能有科研条件，可以很方便地研究这一现象。世界心理学界不必等到1973年才能从 Nils Bejorot 那里得到这个概念。只不过表达这个概念的术语将不是“斯德哥尔摩症状”，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群症状”。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大陆心理学者在那个年代从来没有作研究的条件。

一九三零、四零年代的优秀知识青年，有相当一批出于救国救民的崇高动机投身领袖的事业。这一批人的遭遇是父亲这一代学人经历的一部份。《思痛录》作者韦君宜先生是这批精英之一。“百年人生”丛书编辑慧眼独具，把父亲和韦先生的回忆一同收入这批知识分子的丛书，方便后人比较“干革命”和“作学问”的两类知识人。韦先生出身富裕而有文化的家庭，与父亲背景相似。她青少年时期学业优异，家庭安排她赴美深造，但她选择献身领袖的事业，与父亲走了不同的道路。一九三五年韦先生入党，在清华作地下活动；父亲正往返燕京、清华，优游于文史之中。一九四零年代韦先生投身抗日烽火；父亲正在美留学。一九四六年韦先生夫妇从领袖的“抢救运动”中死里逃生，继续为领袖打天下出力；父亲自美学成回国。一九五零年韦先生夫妇以战胜者身份进京接管文教界，组建青年团，父亲开始接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对比之下，父亲很快接受了当局的价值标准：韦先生这批人走的是光荣的路，自己走的是可耻的路，往者已矣，来事可追，于是才头戴“原罪”紧箍咒。身背追随领袖太晚的包袱，在历次整人运动的荆棘血腥中连滚带爬过来，可到头来还是不被当局接受。父亲并不知道，韦先生这批人中坚持独立人格者，在领袖的组织中多不愉快，他们在“光荣”的背后也看到许多丑陋和邪恶。韦先生的《思痛录》告诉父亲，就算他当年不去留学去延安，不跟陈寅恪跟毛泽东，只要他不肯放弃良知，最终还是要象韦先生等一样被领袖和当局当成异类。追随领袖的知识分子中，只有象康生那类人，为领袖充当“龙爪”，主办“抢救运动”残害无辜才能在那一群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如鱼得水，施展报复。一九九九年，“自由亚洲”电台采访韦先生女儿杨团先生，她对《思痛录》作了重要补充。一九四零年代“抢救运动”中大批投奔延安的青年和知识分子被当作敌特暴力逼供，甚至致死致伤之后，领袖考虑到抗日结束后与蒋介石决战在即，这批人力可资利用。于是在中央党校大会上举手及帽行礼，算是道了歉，说大家从此就应该捐弃前嫌，团结给他打天下了。韦先生夫妇已耳闻目睹和身受数次这种专制暴力，不再轻信领袖的道歉。二人在自己窑洞里商定，这是最后一次原谅领袖。下次领袖如果故态复萌，二人就决不容忍。激动之中，二人吟白话诗一首以明志。这一段故事令人动容。可惜，几年后领袖君临中国大陆，旧戏重演。左、中、右知识分子群体，无一幸免，其规模和祸害远超过延安小城的“抢救运动”。韦先生当年与家庭决裂时义无反顾，这时年事渐高，又有了子女，热血青年的锐气不再，不但未能践当年窑洞之约，还不得不违心说话。韦先生一再看到领袖为建立自己的专制王朝不择手段，有忤自己救国救民的初衷。水火不容的人性和党性，使她受了几十年内心煎熬，终于在晚年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写下。韦先生和父亲这两个知识分子，出身家庭相似，青年以后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晚年却殊途同归，恶梦醒来，各自写下了对盲目追随领袖的反思。我在美国用心聆听了韦先生女儿的讲话，在回家时转述给父亲。既然连父亲尊崇的“老革命”知识分子对领袖的专制都无能为力，父亲这种书呆子就不必为自己跟着领袖趟了混水而过份自责。韦先生的自白

使父亲临终前得以减轻精神包袱，但改变不了历史和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开的残酷的玩笑：为救国救民而投身“革命”的，为服务祖国而学成归来的，都被领袖敲打玩弄半生，许多人在领袖发动的历次整肃中含冤以歿，象韦先生和父亲这种劫后余生者，晚年只能抚摸着身心的累累伤痕叹息蹉跎的岁月。唯有避秦海外的才治学有成，对社会有较大的贡献。难怪有人说早回国（革命）不如晚回国（革命），晚回国（革命）不如不回国（革命）。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九号，我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送走了父亲。百日之后，杨团先生也同在第一告别室送走了韦先生。对照考查韦先生和父亲的心路历程，能有利于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尴尬。应该指出，对父亲这些知识分子未能坚守独立人格，舍“玉碎”而求“瓦全”的指摘，除了发议论者不够理性和负责之外，中国文化也是部份原因。西方文化对个人生命，个人权利这些人权内容着意保护，不轻易要求个人为抽象的主义、礼教或道德规范牺牲人权。在中国文化中抽象的价值高于具体的个人人权，于是衍生出把抽象价值推崇到极端的各种“古训”，例如针对为人臣，为人子者的“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和针对妇女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国民党共产党各自继承了这些文化遗产。国民党倡导“不成功则成仁”，共产党宣扬“砍头不要紧，为了主义真”。可惜这常是领袖元首要害追随者牺牲奉献的说教，自己并不身体力行。在今天彰显人权的时代潮流中，有必要重新思考如何处理抽象教义和具体人权的关系。抗日战争中，中国大半领土沦陷，中国当局只控制西北的延安和西南的重庆这样空间有限的后方。广大沦陷区人口只有少数有条件有能力撤退到后方。多数人即使能去，也绝非后方的土地和资源所能容纳。沦陷区人口的多数因此不得不接受在日军占领下生活的现实，也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和日军合作以换取生存、就业和上学的可能。以民族大义为理由指责这样的合作是不现实的。例如我祖父留在沦陷区，为表示抵制占领，不送家中子女上学费便宜的公立学校，而送他们上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此事在表彰祖父爱国时列为一例。我对父亲说过这种表彰欠妥，因为按此例无经济能力的父母送孩子上占领当局办的公立学校就不爱国了。如果只有让子女当文盲，终生难于谋生立足才算爱国，那我宁肯戴“不爱国”的帽子，就像我庆幸父母一九四九年以后没有坚持独立人格，我才能受教育而获得今天谋生技能一样。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北京南京等大城市的大学，把沦陷时继续任教者当作“伪教授”不予续聘，把在校学生当作“伪学生”，要先办“学习班”一年才能复学毕业。由于波及学生众多，有日后贵为中共要人的也在其中，学生理所当然地向国民党当局反弹，中共地下党从中组织，酿成学生向国民党政府交涉抗议。我认为这是国民党政权受中国文化极端意识影响而罔顾人权的一例，父亲的上级傅斯年参与主持此事，也难辞其咎。就在那个年代，纳粹军队横扫欧洲时许多国家完全无力抵抗，也面临类似中国被日军占领时的问题。他们的政府和民众采取了更明智和有弹性的应付方式，战后对于与占领当局妥协或合作行为的处理也更有理性，显示了西方文化的人性和人权观念，值得国人借鉴。

### （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在历届王朝治下，中国老百姓都以赋税徭役供养当朝文臣武将。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年代，文武大员如疏于职守，沉湎酒色，百姓并不很介意。他们只希望“养官千日，用官一时”，在国事危急，万民蒙难时大员们能置官职、身家于度外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不论是外敌大军入侵，还是暴君倒行逆施，应该首先站出来的就是这些大员。他们享用民脂民膏多年，理应现在报答人民。没有这种准备，就不应担任高职。用比较极端的话概括，就是“文死谏，武死战”。能如此身体力行而青史留名的大员是少数，他们可能平时小节并不甚好，危机临头却能守大节，因此有“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的赞誉。多数大员只做到尸位素餐，明哲保身，等而下之的则是随风转舵，助纣为虐而名节尽失。一九四九年领袖登基以后，满朝文武，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政军大人物们，也有以上各种表演。

领袖曾谈及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的关系，并且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比喻。他所

说的工农大众实际是他们这些自命代表工农大众的革命家和党政军要员。领袖说知识分子这个毛必须附在他们这个皮上。所以一九四九年以后在等级森严的中国社会当然从来都是“皮”来左右国家命运，决定大政方针，“毛”则是完全无足轻重的。“皮”和“毛”所享有的社会地位，物质待遇之间的巨大反差，一直延续到现在。如果大政方针出了毛病，思维正常者当然应该主要向“皮”去追究责任，总结教训。

一九七六年，领袖驾崩，全国开始对他多年以来的倒行逆施追究责任，总结教训，这个讨论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效果不彰。中国至今仍然存在发生另一个专制王朝的土壤。父亲所在的“梁效”在这一讨论中理所当然的成为主要目标之一。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我看到、听到大量文章、讲话、文件以至诗词相声，对包括父亲在内的“梁效”知识分子成员口诛笔伐，嬉笑怒骂。我以为这都无可厚非，他们各人确有自己应当承担的一份责任。这份责任是大是小，则可见仁见智。但我同时认为，无论这些作为工具的知识分子在“梁效”期间多么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把中国推向灾难的主要责任不在他们，而在“皮”：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政军要员们。这些党国栋梁们对领袖的恭维谄媚，并不下于知识分子的曲学阿世。然而，二十多年来我看到的针对“皮”的评议文字，在数量和深度上都比针对“毛”的小得不成比例。李志绥先生的回忆录，关于周恩来卑恭屈膝讨好领袖、江青和林彪有详尽描写。邓小平请江青转呈领袖的效忠信，向领袖山呼万岁，诚惶诚恐检讨自己，以“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自称，保证“永不翻案”。等级在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下的党政军大员们，表现同样不堪。古华先生记下了汪曾祺先生描写大员们的回忆，兹摘录于此。“江青抓现代京剧，第一出抓的就是沙家浜。每回排练，都亲自坐镇广和剧场，看剧组演员在台上一段一段的唱作念打。随侍在江青两侧的，是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公安部长谢富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后来是吴德，以及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等。周总理也来陪过两次，倒是江青把他劝走了。那时江青每讲一句话，重要不重要的，上述大人物们懂戏不懂戏的，都会掏出笔记本来恭恭敬敬地作记录，不敢有半点差池的。有时排戏需要从军事博物馆之类的地方调换军装枪支道具，谢富治、杨成武、萧华、傅崇碧等就会竞先起立，争着亲自去执行命令。有时事情办得不如人意，江青会当众训斥这些大人物，问他们是干什么吃的？江青倒是很少斥责演员。”看了汪曾祺先生的回忆，我附上打油诗一首寄给父亲：“曲学阿世意若何，逢迎毛江蔚世风，部长司令如叭狗，何况梁效一书生。”

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入赘一位上述大人物家，我以以上文字示之。他说他的岳母，该大人物的夫人，在江青权倾一时的年代天天在家大骂江青，那也正是该大人物与同僚们竞相讨好江青的时候。以这些党政军大员的位置，他们应该比作为工具的“梁效”知识分子对毛江了解得更清楚，因而他们那些不堪的表现也就比“梁效”知识分子更值得分析评议，总结教训。可是，我看到的针对他们的文字有限。领袖去世之初，这些大人物有些仍然在位，即使因劣迹昭著而退位的，也还有战友、部下手握实权，所以他们余威犹在。进入九十年代，他们本人退位或去世，战友和部下也离开权力中心。可是他们的子女已茁壮成长，开始从政，领军，经商，成为有权、有枪和有钱的新贵。所以他们的气运始终不衰。谁想写太岁头上动土的文章，就有自身是否安全的考虑。“梁效”知识分子则没有部下的山头、战友的关系网、儿女的太子党，只是当局呼来挥去的工具，一旦当局招牌换记，需要清算前任，还可抛出顶罪，因此是最安全的靶子。国人讨论领袖“失误”已逾二十五年，而中国社会结构，决策机制仍然难于预防再一次的专制，总结责任时的这种避重就轻和隔靴搔痒当是原因之一。

#### （四）复兴人文任重道远

中国在一九三零、四零年代，饱受内忧外患的困扰，然而它的人文学科，却经历了相当的繁荣。聚集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西南联大的人文知识分子，物质生活虽然清贫，在学术自由方面却十分富有。由于国民党当局较少以政治干预学术，学人们得以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并

且和国外同行有自由交流的机会，使中国切实在世界人文学科之林中占一席之地。史语所史学组长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使欧美同行深深折服。他罹患眼疾，英国邀请他去英国治疗，夫人同行，英国负担全部费用，因为英国人认为国际人文科学界需要这位世界级大师继续治学。抗战爆发，陈先生身陷日军占领区，日军当局了解陈先生的国际声誉，频频赠送物资食品以示好，为陈先生夫妇所峻拒，日军大失面子，但仍不予加害，使陈先生夫妇得以安然渡过敌占时期。陈先生没有想到，本国当局的苛政，猛于外国占领军，二十多年后他死于领袖发动的文革。

一九四九年红色王朝在中国大陆揭幕，中国人文科学史黑暗的一页于焉开始。领袖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开宗明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言外之意是知识分子没有“改造”，正在阻挡民主改革和工业化。对全体知识分子的整肃，包括理工科和人文科，迅猛开始。然而，对于理工科某些专业，当局网开一面。领袖需要坦克大炮原子弹，对学军工和原子物理的手下留情，允其边改造边科研。领袖需要治病保健，几位杰出医生得以发挥专长。可是人文科学目的之一是从社会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探求社会更理想的运作方式。领袖和当局自命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意识形态和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因此认为任何进一步的探索都是对自己的挑战，所以必须打压人文学科，以确保“废黜百家，独尊马列”的局面。

人文科学本是全人类共同精神财富，领袖紧闭国门，留在大陆的人文学者一九四九年以后无法与国外同行交流，学术成果自然乏善可陈。他们的同学中定居欧美者，以及外国同行，却在学术、言论自由、资料条件完备的环境中学有所用，成就斐然。等到八十年代国门再开时，年华老去的国内学人看到昔日同窗在西方的学术成果、科研条件，联想自己因学获罪，盛年蹉跎，怎能不感慨唏嘘。

人文学科与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思潮联系密切，学科内容本身对于当局就是敌对意识形态。因此当局对人文学科管束比理工科更为严苛。文化革命中此一政策达到顶峰。在所有大学的所有学科长期停课，领袖说“理工科大学还要办”。理工学科见到一线生机，人文学科仍被窒息。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当局对人文学科重镇北大大幅度升高管制，对北大新生强制军训一年，令有志人文的资优学子却步。近二十年来理工科如清华毕业生占据领导职务数量之高，人文学科如北大毕业生占据领导职务数量之低，均大大不成比例。国人诟病为“满清（华）王朝”和“清华帮，北大荒”。发达国家领导人学历结构，多数为人文学科出身，理工科背景者至多达到阁员和顾问的级别。这和中国情况恰恰相反。近二十年来，大陆人文科学处境有所改善，但远不尽如人意。当局对于人文学科拨款，仍然以政治为第一考虑。从事党史、军史研究的人文学科从业员，职位高，经费足。北大历史系教师沙某，去党校研究党史，获副部级头衔，大大高于原来系内同人，因此不愿再回北大，因区区北大史系放不下副部级官。对于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张，他严守当局立场，鞅伐甚力。党、军史研究著作大量印刷，销量好坏没有关系，在当前党库即国库的状况下，不必担心成本与收益。

自由民主人权意识作为西方人文科学的重要部份，冲击了当局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当局的因应之道是以国学，即本土文史科学对抗西方人文科学。于是拨巨款兴办“夏商周断代工程”。意思是我泱泱中国，有比西方更长的历史，我们的人文科学自成系统，不必向西方求教。当局科学长官宋健在大会上说各文明古国如埃及等都对自己历史断代有科学考证，唯独中国历史断代不清，害他在参观外国博物馆时频频脸红，以此指责大陆历史考古学人无所成就。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历史考古学人被政治整肃，开门办学之类搞得人仰马翻，从无安心治学的机会。领袖对“厚古薄今”的批判，更令学人对有关课题避之唯恐不及。现在宋倒打一耙，学人理应拍案而起，讨还公道，无奈经费在当局手里，学人有苦难言。

当局不善待人文科学，社会公众也认为它没有经济效益。甚至大学中教育从业员，因为人

文系科除外语以外无法与理工科比创收，人文科学从业员苦于“书卷难为稻粱谋”，也厚理工轻人文。人文科学过去被政治所践踏，现在被金钱所排挤，中国连续两三代人口与人文学术基本绝缘，其结果将在今后几十年消极地影响社会风气，人群教化和民族素质。国人似乎认为只要有钱就有了一切，而不知道只有财富技术而没有文化教养的民族并没有光明的前途。

对于中兴人文学科，父亲并不盲目乐观。他虽然近年来写过“百年感怀”之类应景文章，颂扬中国敦煌学成就，但他知道扬理工抑人文的基本国策不易改变。父亲去世前一个月，弟弟和我送他去中日医院参加所谓“院士”体检。这恐怕是国内理工科和人文科精英学人共聚一堂的唯一场合。两组学人人数，年龄和健康的对照正是两个学科现状的反映。风烛残年的人文学科“院士”以轮椅代步，而“早晨九、十点钟太阳”的理工院士健步如飞，突显出人文学科后继无人。据说只给理工科院士而不给人文院士的原因是“理工科研成果能和世界水平比较，而人文则不能”。四十年代史学家陈寅恪享有的国际声誉早已证明此说无据。当今西方各国和台湾授予最高学术称号对理工和人文也一视同仁，只有中国大陆另有章程，原因只能到当局对人文科学的偏见中去找。据知情者说，目前掌社会科学部门权力者，多是没有学术可言的党工，如设人文院士，授予掌权者难以服众，而有成就的人文学者，又被当局认为背离官方意识形态散布精神污染而不愿授予，所以干脆不设人文院士。我曾问父亲为什么比他年轻的同事、学生不能作为文科院士来体检，父亲说，当局不肯给他们院士名义，连父亲自己都是“假院士”呢。父亲首倡的这一称号，浓缩了这一代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辛酸，在他的同事邻居学人中很得人心。父亲所在的北大教授居住区请各住户填写调查问卷时，职称一栏就有人填了“假院士”。父亲耕耘过的人文科学，离繁荣显然还有很长的路。

~~~~~

## 【往事追忆】

### 红卫兵小报和我（十三）

• 周孜仁 •

（续上期）

文革史家王年一在《“五一三”事件——一场大有来头的小型武斗》中说，1967年支左之初，绝大多数大军区的“支左”都因支错而挨批，弄得十分为难。“1967年4月，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就提出过：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坚决拥护，但为了避免军队犯错误，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一些，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以便给各地派出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搞错。如果这个办法不行，由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小组接受指示也好。这个登了会议简报的意见无疑是合理的，而且有代表性，但‘无产阶级司令部’未予采纳，大概一时也难以定夺，或者是怕背上包袱。各大军区经过调查研究，陆续表态，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支持了党团员多、出身于贫下中农和工人的多、复转退军人多、劳动模范多，并且拥护军队、比较讲政策和守纪律的一大派（如武汉军区支持了‘百万雄师’）。但是，都被“无产阶级司令部”认为是支持错了。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看来，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只能依靠激进的造反派。于是几乎每一个大军区的负责人都向中央作了检讨”

会议的结果无疑是对54军（即重庆警备司令部）支左成绩的充份肯定。他们能在上述背景下做到这一步，应该说非常可以了。作为革联会主任刘润泉当然十分满意。他在讲话中高兴地表示“会开得很好。”并说：“镇反工作要规定三条，不管任何人假借镇反为名，镇压左派，调查清楚后要严加惩办；二，如果有人背着革联会干坏事，调查清楚后要严加惩办；三，今后



逮捕人要经过警备司令部党委批准。”54军参谋长耿志刚也到会助兴，他代表警备司令部全体指战员表态，称：“革联会好得很！我们过去支持革联会，现在支持革联会，将来还要支持革联会。我们坚决支持革联会，我们坚决保卫革联会，支持和保护左派广大革命群众。”

就在会议开得热热闹闹的差不多同时，思想处于极度迷乱的我，为《山城战报》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祸。这就是在刊登革联会“关于目前重庆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通告”的那一期报纸，我在第二版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吹响进军号，迎接大决战”。出版时间是4月9日。按此推算，文稿应该是正开会前后写的。这篇文章的是非是这样惹出来的：

对于当时的形势的解释，当初在八一五派内有这样一些提法：一是“二月分裂主义黑风”。这个提法实际上是在对中央二月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提出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当时气势还盛的砸派和刚刚被打倒的走资派、保守派捆在一起，以便冠冕堂皇地对831、915等大张挞伐；二是“三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北京已经提出了反复辟反逆流，而在重庆，因西师831等被镇压而出现的保守派反夺权，恰好又发生在这一段时间，这个提法，于是就专指了保守派的反夺权。四月份开始平反砸派冤案，对保守派的反夺权给予纠正，旧恨新仇一股脑儿爆发，八一五派于是一下子就有了许多政敌：才被他们平反的831们是一拨。刚刚投入八一五怀抱而马上又被他狠狠一脚踹开的保守派，又是一拨。对八一五一贯耿耿于怀、站在一旁看笑话的保守派、走资派，又算一拨。面临几股反对力量，不知如何招架，干脆一起对付，于是就有了第三个提法：“反对多边围剿”。文革那会儿，把自己说成受害者，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地位受到挑战，又很容易号召大家同仇敌忾，抵御外侮。这些提法力图 and 北京的正宗提法接轨以便为自己提供合法的理论依据，从另外一个角度，显然又力图把北京的正宗提法搅成了一锅粥：客气一点说，是鱼目混珠；说恶毒一点——用当时的说法——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只是当时，我的思想确实非常混乱，于是便在混乱之下，按照当时八一五内部流行的“多边围剿理论”写出了这篇社论，并且很快在编辑部获得通过并付印。这一次，又是我自己重演了“事后诸葛亮”的笑话。这件事情记录在4月9日的日记上：“晚上回校，我和《八一五战报》的同志们又一道讨论了形势，大家基本上同意了我的观点，否定了‘多边围剿论’，于是我急急忙忙挂电话给《山城战报》，阐明了我的观点，希望同志们马上考虑，如果这篇社论真有问题，该马上通知印刷厂停印。他们又同意了我的观点。”问题是，第二天一早，我匆匆忙忙进城，匆匆忙忙返回《山城战报》，日记记录：“奇怪，刊有这篇社论的《山城战报》已经在街上出售！我急忙向大家谈及这一事，并迅速挂电话给印刷厂和发行科，要求立即停止发行，并将已发出的报纸迅速追回。/ 可惜，事情已经迟了。这一天，街上已经出现了大标语：/ ‘《山城战报》4·9社论是大毒草，必须批判！’”

作为补救措施，报社确实把4月9日出版的《山城战报》第八期收回了，在该社论的位置换成了上海《文汇报》4月7日的社论“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重新印刷后重新发行，同时刊发了一则“紧急启事”，称：“本报四月九日第八期社论‘吹响进军号，迎接大决战’有严重错误，特紧急声明这篇社论撤消，已发出的少量报纸作废。并于四月十日将本报第八期改版重印。”这样，第八期的《山城战报》就有了两个版本和两个出版日期。如果用集邮爱好者的术语来说，就是多了一个“错版票”。这也算是文革小报历史上的一道风景线了。

随着对革联会“支”和“砸”的斗争的明朗化，《山城战报》社论凸现出的思想迷乱也很快结束。那些天，几乎天天都有人来重大声援游行。有大学的，有中学的，也有工人和别的什么队伍，他们敲着锣，打着鼓，喊着口号：“向重大八一五学习！”“向重大八一五致敬！”，闹腾得重庆大学的校园夜夜不得安眠。“每闻风飙之起，常怀凌云之志”。躺在床上的迷乱的大学生们于是纷纷一爬而起，夹道欢迎。于是掌声、欢呼声、口号声汇成一片，响彻夜天。

有一天晚上回校，正遇了这种情形，我于是也激动万分地挤在队伍里和大家一道呼口号，

一道鼓掌。这时，我突然遇到挤在队伍中的薛英江：电机系的激进派，上面提到的“偏在寒中俏”战斗队发起人邹世友的同班同学，于是我问他：“你还砸吗？”他显然也很激动，回答我：“不砸了。”我问：“为什么？”他回答得很干脆：“砸派要把我们打成叛徒，那怎么行？”

4月12日，重大八一五在风雨操场举行全团辩论大会。会议刚刚开始，便有人跑上台前写了一幅动人心魄的大标语：“誓死捍卫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算是一锤定音了。人一旦陷入宗教狂热就必然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教义的盲目崇拜，并任由这种盲目崇拜所掀起的激情泛滥，放纵自己而随波逐流。革联会既然是一月革命的产物，而一月革命又是比“十月革命”“更伟大的”的历史创举（《815战报》第十五期：“重庆大学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对目前形势的再次严正立场”），再对它怀疑不啻是无知，而完全就是触犯天条了。这样一来，以后的行为只需要诉诸情感的神圣激发而不必再作任何理性判断。这一次辩论会，已经没有任何杂音。

重大八一五需要用行动向世人宣示自己的统一意志了。四月十五日，周末，他们和师专八一五、重建八一八等沙坪坝区的造反派组织以纪念八一五事件8个月为名，举行串联游行。队伍由沙区出发，途经小龙坎、石桥铺、大坪、两路口直涌市中区，一路上，人越汇越多，到解放碑——日记载：“已经汇成了数十万人的洪流”——这个说法显然很夸张，不过，反正谁也没点过数，场面总之蔚为壮观就是了。第二天，八一五派又在尚未涨水淹没的长江珊瑚坝集会，日记载：“近百万支革派冒雨召开誓师大会”，这个“近百万”，显然也是很夸张的数字，同样也谁没点过数。会议题目是“向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发动总攻”，实际目标当然谁都知道是要炫耀支革派的实力。我已经记不起54军的首长们是不是到了会。而李井泉诸人绝对是参加了。他们是会议必不可少的道具，因为：只要恶狠狠地把他们揪到台上低头示众，就表示了自己的大方向始终正确。

作为对等的行动，为了表示自己的大方向也始终正确，砸派决定在下一个周日（23日）也开一个类似的大会，题目定为：“打倒刘邓陶，砸烂革联会”为此，他们向“伪革联”发出一份“勒令”，令其交出李井泉等诸道具供其批斗时使用。对这一道难题，革联会是很当一回事的，为此专门开了一个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会议商量对策。已被激怒的八一五这次没有给八三一们好脸色了。秦安全代表重大在会上发言，称：首先，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是向刘少奇开火，砸派砸烂革联会显然是在转移斗争大方向；其次，砸派砸烂革联会，本质上是企图否定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最后，秦提出了一个很有震撼力的全新观点：砸派的行为实际上是在为萧、李、廖翻案。萧、李、廖是指早在1963年5月在重庆市委20次全委扩大会就被搞掉的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据说三人因为上书中央状告李井泉在四川的种种问题，而状纸几经辗转，又回到了李井泉的手上，对此，大权在握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李政委”当然决不轻饶，严令重庆市委对三个犯上作乱的胆大妄为之徒严加整肃。三人原均为重庆政坛的年轻才俊，萧为市委组织部长、李为副秘书长、廖为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都是市委书记任白戈的心腹爱将。无奈李政委催逼太急，任虽欲保挟过关已不可得，李甚至威胁任说，如不处理萧、李、廖，就得考虑他自己的问题了。六十年代的共产党市委书记只好上演一场挥泪斩马谡的苦戏。三人虽被统统革职，三年后的1966年6月，重庆市委为保自己过关，又旧帐重算，仿效北京批判“三家村”，把肖、李、廖这三只“死老虎”又拖出来作为重庆“三家村”的黑后台大批特批一通。不意仅过数月，市委头目便纷纷落马，而且连气壮如虹的李井泉自己也摇摇欲坠，这时的萧、李、廖，确实想和罗广斌一样乘机翻案，还一个清白男儿身。政治嗅觉十分灵敏的首都三司确实是在三人身上也大动了一番脑筋。“北地东方红”早在1966年底即把李、廖秘密接到北京，住进地院，后又悄悄弄到成都，转入四川大学，要他们揭发李井泉问题，企图像刘、张一样，把他们作为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秘密武器。几十年后，我曾问过八一五总团的核心人物黄顺义：对此情况，你们当时是怎么知道的？黄回答我说，他对此一无所知。那么秦安全哪儿弄来的情报呢？就不得而知了。重要的是，该情况的新鲜感和冲击力本身就让人耳目一新，这就够了。

秦指出：在这次运动中，市委的实力派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以肖、李、廖为代表的少壮派则并未受到多大打击，当前砸派的活动，实际上就是在为这些不甘于失败的少壮派翻案、反夺权！秦读书时一直是学生会干部。在饥饿年代度过青春期、个子普遍偏矮的一代人中间，秦算得上身材一流了，用现代术语说：帅哥。八一五总团勤务员当中，他出道较晚。八一五战斗团成立伊始，他一直被派往全市的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工作，校内鲜为人知。他第一次回校亮相，是“124事件”后，在那次关于罗广斌组织“赴京告状团”和“联合指挥部”问题的辩论会，他的演说一鸣惊人，从此后，他便以办事稳健干练而在总团里声望雀起。他的演讲词虽无周家瑜的煽动激情，但却事理俱在，逻辑严谨，很有说服力。一言既出，常常满座为之叹服。

革联会的这次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砸派如果不用“勒令”，对革联会的称谓上不用“伪”字，可以考虑将道具给出。否则：坚决不给。

作为报复，4月21日，西师八三一、西农八二六、川外八二六等组织，对北碚地区支革派召开的“向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发动总攻誓师大会”发起造反。大会地点依然是北碚解放台，正是八三一头目周荣一帮人的耻辱地，所以造起反来怒不可挡。其时，重大815宣传车正在会上奏乐助兴，八三一们一涌而上，顿时把车、广播器材及铜管乐器全部砸了稀吧烂。815的传单叙述此事，说那一批铜管乐器价值上万元。在当时，这是足以把人吓死的天文数字，显然太夸张了，不过说它值钱倒不假。再说，从造反一开始就一直掌握在重大业余文工团员手上的这批乐器，每次游行，特别开始，全重庆的造反派都还非常寒碜，这批铜管乐器在队伍前面一列队，一走步，一吹奏，确实为八一五大壮行色。感情很深了。如今这些宝贝被反目成仇的八三一们公然砸烂，八一五的愤怒可想而知。消息传来，正在重大集会的师专附中、一中等八一五派，立即和重大学生一起，杀气腾腾，直奔北碚示威而去。示威人等一律身着民兵装，腰扎皮带，有点北京高干子女在“红八月”搞红色恐怖的劲头，吓死人的。次日，不依不饶的重大及沙区学生上万，继续盛怒游行。被砸坏的宣传车、广播器材、铜管乐器等等，全数随队展示，作为砸派挑起武斗的如山铁证，在市中区上、下半城杀气腾腾地绕行一天。再次日，砸派在大田湾召开大会，就是上面说的“打倒刘邓陶，砸烂革联会”的大会，八一五继续以牙还牙，对本来就不甚庞大的游行队伍实施围堵、嘲弄、捣乱，弄得人数本来就不多的游行，整整折腾了四、五个小时方才了结。

（未完待续）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吕青（加拿大）     | 熊波（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